

西方文库·思想译丛

时间的种子

The Seeds of Time

Frederic Jameson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著 王逢振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时间的种子

The Seeds of Time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著 王逢振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的种子/(美)詹姆逊著;王逢振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2

(西方文库·思想译丛)

ISBN 7-5343-7320-4

I. 时...

II. ①詹...②王...

III. 后现代主义—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0637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时间的种子

作 者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译 者 王逢振

责任编辑 胡群英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电话 010-80366605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插页 2

字 数 188 000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定 价 24.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英文版编者的话

韦勒克图书馆批评理论系列讲座每年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举行一次,由该校的批评理论研究所承办。本书据 1991 年 4 月的演讲写成。

译者前言：重温詹姆逊和《时间的种子》

17年前，我曾写过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当时心里主要是敬佩；今天再写，这种心情仍在，但又增添了深厚的友情。自从1982年与他相识，至今已经23年，这中间不仅交往没有中断，而且日益密切，彼此在各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我称他为老友。

说来也是缘分，1982年秋季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正好11月詹姆逊应邀到那里讲学，大概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想了解中国，他主动与我联系，通过该校的罗伯特·马尼吉斯教授约我一起吃饭，并送给我他的两本书：《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政治无意识》，还邀请次年我到他任教的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访问。

说实在的，他送的那两本书我当时读不懂，只好硬着头皮读。我想，读了，总会知道一点，交流起来也有话说。读不懂的地方还可以问。1983年春天，我应邀去了圣克鲁兹，我对他说有些东西读不懂。他表示理解，并耐心地向我进行解释。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个星期，住在他家里，并通过他的安排，会见了著名学者海登·怀特和诺曼·布朗等人，还作了两次演讲——因为当时我在《世界文学》编辑

部工作，主要是介绍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的情况。

1983年夏天，我们一起参加了在伊利诺大学(厄班纳—上滨)召开的“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的重新阐释”的国际会议——正是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一些著名学者，如佩里·安德森(英)、G. 佩特洛维奇(南斯拉夫)、亨利·勒费弗尔(法)和弗朗哥·莫雷蒂(意)等人(我在会议上的发言与他们的发言后来一起被收入了《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阐释》一书)。此后，1985年，我通过当时在北京大学国政系工作的校友龚文库(现为北京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的帮助和安排，由北大邀请他作了颇有影响的关于后现代文化的系列演讲。他在北京四个月期间，常到我家做客，从此我们便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我到杜克大学访问，也住在他家里。

* * *

詹姆斯生于美国的克利夫兰，家境比较富裕，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幼年还学过钢琴，对音乐颇有悟性。他聪明好学，博闻强识，20岁(1954年)在哈佛福特学院获学士学位，22岁(1956年)获耶鲁大学硕士学位，接着在著名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指导下，于25岁(1959年)获得耶鲁大学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其间获福布赖特基金在德国留学一年(1956—1957年)，先后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1959年至1967年在哈佛大学任教，1967年到新建的圣迭哥加州大学任教，在那里，他遇到了一度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和激进学生领袖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此后，从1976年到1983年，他在耶鲁大学任法文系教授，1983年转至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1985年夏天，杜克大学为了充实和发展批评理论，高

薪聘请他到杜克大学任讲座教授，专门为他设立了文学系（即 Graduate Program in Literature），由他任系主任，并决定该系只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区别于英文系。记得当时还聘请了斯坦利·菲什、简·汤姆金斯，以及年轻有为的弗兰克·兰垂契亚（Frank Lentricchia）和乔纳森·阿拉克（Jonathan Arac——后来没去，现为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主任）。从那时至今，他一直在杜克大学，2003年辞去系主任职务，但仍担任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和人文学科教授委员会主任。

1985年他刚调到杜克大学时，该校给了他一些特殊待遇。正是这些特殊待遇，使他得以于1985年秋到中国讲学一个学期（他的系列演讲即后来出版的《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并从中国招收了两名博士研究生：唐小兵和李黎。唐小兵现在是芝加哥大学副教授，李黎是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董事长。由于詹姆逊对中国情有独钟，后来又从中国招收过三名博士生，并给予全额奖学金，他们分别是张旭东、王一蔓和蒋洪生。张旭东现在已是纽约大学的教授。

* * *

到70年代中期，詹姆逊已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但直到《政治无意识》出版之后，他的独创性才清晰地显现出来。他在该书的一开始就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总是要历史化！”以此为根据，他开始了 he 称之为“元评论”的方法论的探讨，对于长期存在的美学和社会历史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提出了一种自己的回答。与传统的历史批评形式相对，詹姆逊不仅把文化文本置于它们与历史语境的直接关系之中，而且从解释学的角度对它们进

行探讨,探讨解释的策略如何影响我们对个体文本的理解。但与其他现代解释理论不同(例如罗伯特·姚斯的接受理论),詹姆逊强调其目标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所有其他的解释策略,而其他的解释都是片面的。

《政治无意识》奠定了詹姆逊在学术界的地位。有人说,詹姆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只有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写出过和他同样重要的作品”。“詹姆逊是当前文坛上最富挑战性的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对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人物的解释,他对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解释,以及他对卢卡奇、萨特、阿尔都塞、马克斯·韦伯和路易斯·马丁的解释,都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欧洲思想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詹姆逊对小说发展的论述,对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论述,对巴尔扎克、普鲁斯特、阿尔桑德洛·曼佐尼和阿尔·罗伯-格里耶这些欧洲作家的论述,以及他对包括海明威、肯尼思·勃克和厄休拉·勒奎恩在内的各类美国作家的论述,构成了强有力的政治的理解。”“詹姆逊是当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很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以社会历史为导向的批评家……他的《政治无意识》是一部重要著作,不仅文学家要读,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哲学家都应该读它。”“在大量的批评看法当中,詹姆逊坚持自己的观点,写出了最动人的谐谑曲式的著作。”

在《政治无意识》里,詹姆逊认为,批评家若想解释文本的意义,就必须经历一系列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体现在文本之中,通过系统地解码揭示出来。为了做到这点,他汲取20世纪各种理论资源,从诺斯罗普·弗莱的四个解释层面到雅克·拉康的无意识理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到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论述,几乎无一不被他加以创造性地利用。在他看

来,马克思主义批评不是排他性的或分离主义的,而是包容性的和综合性的,它融合各种资源的精华,因此可以获得更大的“语义的丰富性”。批评家应该考察文本指涉的政治历史、社会历史(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生产方式的历史。但这些方式不是互相取代,而是互相交叠融合,达至更高层次的普适性和更深层次的历史因果关系。

* * *

詹姆逊的理论和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就文学批评而言,主要表现在历史主义和辩证法方面。他是一个卢卡奇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超越了卢卡奇的怀旧历史主义和高雅人道主义。他所关心的是,在后结构主义对唯我论的笛卡儿主义、超验的康德主义、目的论的黑格尔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和复归的人道主义进行深刻的解构之后,人们如何严肃地对待历史、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非人化的问题;也就是说,“面对讽刺的无能,怀疑的瘫痪,人们如何生活和行动的问题”。詹姆逊认为非常迫切的问题是:对“总体化”(totalization)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包括与之相关的整体性的概念、媒体、历史叙事、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本质与表面的区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等等,是不是要预先构想一种理想的哲学形式?是否这种形式必然是无视差别、发展、传播和变异的某种神秘化的后果?他大胆而认真地探讨这些问题,但他尽量避免唯心主义的设想,排除神秘化的后果。

在他的第一部作品《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1961年)里,詹姆逊分析了萨特的文学理论和创作。该著作原是他任耶鲁大学的博

士论文,由于他的导师埃里希·奥尔巴赫以及与列奥·斯皮泽相关的文体学的影响,作品集中论述了萨特的风格、叙事结构、价值和世界观。这部著作虽然缺少他后来作品中那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和政治理解,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刻板而因循守旧的语境和陈腐的商业社会传统,詹姆逊的主题萨特和他复杂难懂的文学理论写作风格(那种以长句子著称的风格已经出现),却可以看做他反对当时的守旧思潮,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批判型的知识分子的开端。如果考察一下他当时的作品,联想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不难看出他那时就已经在反对文学常规,反对居支配地位的文学批评模式了。可以说,詹姆逊的所有作品构成了他对文学批评中的霸权形式和思想统治模式的干预。

60年代,他受到新左派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影响,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形式》(1970年),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辩证传统。自从在《语言的牢笼》里对结构主义进行阐述和批判以后,詹姆逊集中精力发展他自己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先后出版了《侵略的寓言:温德姆·路易斯,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现代主义者》(1979年)、《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1981年)和《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年),同时出版了两卷本的论文集《理论的意识形态》(第一卷副标题为《理论的境遇》,第二卷副标题为《历史的句法》,两卷均于1988年出版)。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他还出版了《可见的签名》(1991年)和《地缘政治美学》(1992年),收集了他研究电影和视觉文化的文章。此后他出版了《时间的种子》(1994年)和《文化转向》(1998年)两部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著作。这期间,他仍然继续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出版了《后期马克思主义》(1990年)、《布莱希特与方法》(2000年)和《单一的现代性》(2003年)。

在詹姆逊的作品里，除了《萨特》一书之外，他一直坚持两分法或辩证法的解释方法。应该说，他的著作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人们不难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便他的哪一篇文章或哪一本书，在风格、政治和关注的问题方面，都存在着某种明显的相似性。实际上，今天阅读他的《理论的意识形态》里的文章，仍然会觉得这些文章像昨天刚写的一样。然而，正如詹姆逊在论文集的前言里所说，在他的著作里，重点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经转到了纬：从对文本的多维度和多层面的兴趣，转到了只是适当地可读（或可写）的叙事的多重交织状况；从解释的问题转到了编史问题；从谈论句子的努力转到（同样不可能的）谈论生产方式的努力。”换句话说，詹姆逊把焦点从强调文本的多维度，如它的意识形态、精神分析、形式、神话—象征的层面（这些需要复杂的、多种方式的阅读实践），转向强调如何把文本纳入历史序列，以及历史如何进入文本并促使文本的构成。但这种重点的转变同样也表明詹姆逊著作的连续性，因为从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他一直优先考虑文本的历史维度和政治解读，从而使他的批评实践进入历史的竞技场，把批评话语从学院的象牙塔和语言的牢房里解放出来，转移到以历史为标志的那些领域的变化。

因此，人们认为詹姆逊的作品具有一种开放的总体性，是一种相对统一的理论构架，其中不同的文本构成他的整体的组成部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精神分析到后现代主义，许多不同的观点都被他挪用到自己的理论当中，通过消化融合，形成他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詹姆逊著作的主线，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他利用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阐释，对文化文本中意识形态的构成因素进行分析和批判，并指出它们的乌托邦内涵，这使他不仅对现行社会进行批评，而且展现

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看法。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厄斯特·布洛赫的影响下,詹姆逊发展了一种阐释的、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观。

詹姆逊早期的三部主要著作及其大部分文章,旨在发展一种反主流的文学批评,也就是反对当时仍然居统治地位的形式主义和保守的新批评模式,以及英美学术界的既定机制。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和美国出现,《马克思主义和形式》可以说是对这一思想的介绍和阐释。但在这部著作中,詹姆逊还提供了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如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布洛赫、卢卡奇和萨特等,并从对他们的分析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偏爱卢卡奇的文学理论,但坚持自己独特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并在他后来的作品里一直保持下来。

卢卡奇论现实主义和历史小说的著作,在詹姆逊观察文学和对文学定位方面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他一直不赞同卢卡奇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不过,他挪用了卢卡奇的一些关键的概念范畴,例如物化,并以此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命运。在詹姆逊的著作里,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包括把文化文本置于历史语境、广义的历史断代,以及对黑格尔的范畴的运用中。他的辩证批评主要是综合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它们融合成一种更全面的理论,例如在《语言的牢笼》里,他的理论融合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以及俄国形式主义。在《政治无意识》里,他广泛汲取其他理论,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拉康的心理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等等,把它们用于具体的解读,在解读中把文本与其历史和文化语境相联系,分析文本的“政治无意识”,描述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时刻。

对詹姆逊来说,辩证的批评还包含这样的内容:在进行具体分析的同时,以反思或内省的方式分析范畴和方法。范畴连接历史内容,因此应该根据它产生的历史环境来解读。在进行特定的、具体的研究时,辩证批评应该考虑对范畴和过程的反思;应该考虑相关的历史观照,使研究的客体在其历史环境中语境化;应该考虑乌托邦的想象,把当前的现实与可能的选择替代相对照,从而在文学、哲学和其他文化文本中发现乌托邦的希望;还应该考虑总体化的综合,提供一种系统的文化研究的框架和一种历史的理论,使辩证批评可以运作。所有这些方面都贯穿于詹姆逊的作品,而总体化的因素随着他的批评理论的发展更加突出。

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是他的理论计划的合乎逻辑的后果。他最初对后现代文化特征的分析见于《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一文,而他的综合思考则是他的长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他对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要素”进行了系统的解释。

在他的分析里,詹姆逊根据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模式,把后现代文化置于社会阶段论的理论框架之内,指出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组成部分。他宣称,后现代主义的每一种理论,都隐含着一种历史的断代,以及“一种隐蔽或公开的对当前多国资本主义的立场”。依照厄尼斯特·曼德尔在其著作《晚期资本主义》中的断代方式,詹姆逊提出:“资本主义有三个基本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标志着对前一个阶段的辩证的发展。它们分别是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当前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通常人们错误地称做后工业资本主义,但最好称做多国资本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与这些社会形式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文化形式。

* * *

《时间的种子》是詹姆逊根据他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一年一度的韦勒克系列学术演讲改写而成的。虽然篇幅不长,但因那种学术演讲十分重要,他做了精心准备,此后又经过两年多的修改补充,所以实际上是一部论后现代主义的力作。在这部作品里,詹姆逊以他惯有的马克思主义辩证观点和总体性,提出了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内在矛盾:二律背反或悖论。他关心整个社会制度或生产方式的命运,心里充满了焦虑,却又找不到任何可行的、合理的方案,于是便发出了这样的哀叹:“今天,我们似乎更容易想象土地和自然的彻底破坏,而不那么容易想象后期资本主义的瓦解;也许我们的想象力还不够强。”然而他并不甘心,仍然试图在种种矛盾中找到某种办法。出于这种心理,詹姆逊在《时间的种子》里再次提出乌托邦的问题,试图通过剖析文化的现状,打开关于未来世界的景观;但这无疑是毫无把握的事情,因此他说这是“用一副不完整的牌给未来算命”。

《时间的种子》由三部分组成: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乌托邦、现代主义和死亡,后现代主义的限制。第一部分着重论述后现代时期思想争论中看似无法解决的悖论。詹姆逊认为,这些悖论围绕着“自然”的概念、反基础论和反实在论的条件以及对乌托邦的无力思考或拒绝思考而转来转去。因此,通过对它们的描述,他试图勾勒出这些争论的“无法表现的外部”,以为“这些无法表现的外部”便是未来的轨迹。这里,所谓“无法表现的外部”实际指“表征危机”,本身充满了矛盾、悖论和混乱,但又隐含着后现代文化的内在逻辑,涉

及许多哲学观念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时空观念，即时间的虚构性在后现代社会空间里日益戏剧化，时间由空间决定，传统的历史性受到挑战，而叙事实际上是历史性的，因此难以真实地表现那些争论的外部表象，只能进行适当的勾勒和描述。詹姆逊根据时空关系重新思考他一向坚持的历史性，并认为“这些无法表现的外部”便是未来的轨迹。

在第二部分里，詹姆逊通过分析苏联作家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乌托邦小说《切文古尔镇》，讨论了在第二世界的苏联关于乌托邦看法的独特性。他认为，在苏联那样的地方，商品拜物教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远不像在后期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那样巨大。因此，对根据那种社会而写的乌托邦小说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会说明即将出现的未来，或者说，有助于构想后现代之后的社会。这同他一贯坚持的主张是一致的：西方知识分子若要认识和批判自己所处的社会，应该从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角度反观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

第三部分通过考察当代建筑中的一些思潮和倾向，试图说明后现代的某些局限。他认为，尽管后现代艺术似乎变成了无规则约束的东西，但其在空间的定位以及拼凑起来的过去的风格，仍然是主体认识的结果，这种认识不仅因主体在空间的位置而受到限制，而且还因艺术作品（如建筑）本身的空间而受到限制。例如，就建筑而言，后现代主义一方面采取反美学的立场，使城市建筑变成了“碎片”，失去了整体性；另一方面，它又在局部上模仿过去的各种风格，在美学、空间和意识形态上都构成某种约束，形成明显的局限。詹姆逊通过对这些局限的描述，大胆提出了关于后现代性的界限：应该承认第一部分讨论的“无法表现的外部”，但必须超越它。在《时间的种子》里，詹姆逊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寻求用什么方式来代替当前的状况，用什么方式来介入生活中否定的现实。他认为，重

要的是分析现实,解开它的矛盾,想象它的后果,想象它的后果的后果,推测现在的倾向和潮流在充分发展之后会采取什么机制。因此,在他看来,整个后现代主义理论都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言,但又缺乏充分的根据。

在《时间的种子》里,每一部分都试图分析判断文化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前景,但三部分所依据的方法论却不完全相同。第一部分重点论述当代思想和意识形态中的二律背反,不考虑各种观点的不连续性,而是找出一些关键的交汇点,使对立的观点面临共同的困境。显然,詹姆逊的构想是:一些特殊的观点和文本共有一种无法表现的基础,而这种基础只能作为合乎逻辑的悖论来表达。应该说,在这一部分里,詹姆逊是在用辩证的方法,对矛盾的运作方式进行实验性的描述。这也是他的“后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观点的继续,因为这里他提的观点和文本的共同基础,实际上仍然指整个社会和文化;虽然社会和文化有其内在的逻辑,但其后现代的表征却呈现为充满悖论和二律背反状态,要真正了解文化的内在逻辑,就必须首先清理外在的矛盾,詹姆逊所做的描述实验,其目的正在于此。尽管他不可能描述大量存在的悖论和二律背反,但他所提供的它们运作的方式,无疑为人们认识后现代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品的第二部分乍看显得突兀:它仿佛是一篇有深度的文学评论,与第一部分的纯理论阐述在风格上颇不一致。其实,它们之间存在着更深层的联系。这部分采取弗洛伊德主义或深层心理分析的方式,探索压抑和否定的问题。由此出发,詹姆逊认为,普拉东诺夫的乌托邦并不是反讽性的,也不是反共产主义的,而是对共产主义经历的一种再现:《切文古尔镇》的可怕景象和真正暴力,恰恰是对它的乌托邦冲动的真实性所付的代价。通过把《切文古尔镇》置于后现代的语境加以认识和分析,詹姆逊试图表明:不仅存在一种

第二世界的文化、一种社会主义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因其脱离商品拜物教而独具特性。这种特性正是后现代世界观中缺失的东西，是过去不得不以某种暴力压制的东西。显然，在后现代的混沌之中，詹姆逊是在探索社会的出路。他无力直接触动社会的机制，只能通过文化探索和文化批判来提高人们的认识，进行文化介入和文化干预，于是他便从第二世界或社会主义的过去的文化历史中寻求可资借鉴的东西。因此，尽管这部分显得突兀，但却是从第一到第三部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正如他自己所说，它“使对过去的一些反响处于适当的位置，它们在结构上虽不出现，但肯定也限定我们即将到来的未来”。

在最后一部分里，詹姆逊挪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因为这部分假定了一个严格封闭的概念，以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形方式，提出了有限数量的概念的组合同可能性。但他运用这种技巧不是探讨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如像在第一部分那样，而是探讨美学的多样性或多元主义。他通过对建筑艺术的分析指出，现代艺术形式和风格的丰富多样，在后现代时期变成了“无规则约束的”东西，再不可能将一个时期归纳为某种一般化的时代风格，如巴洛克式的或哥特式的。然而，现代时期的形式和风格并没有消失，它们一直持续到现在，因此从另一方面说，后现代也被它所包含的风格从结构上加以限定，它本身的包容性在总体上具有任何一种风格的特征，换言之，它抵制美学或风格的整体性。詹姆逊曾将后现代主义说成是一种风格的概念，这里他显然有些改变了以前的看法。他自己也说：他曾过高地估计了实际存在的后现代“风格”的多样性，忽视了结构主义的教训。

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整体性是一种结合或置换的结构，不论其过程具有多么不可言喻的易变性和流动性，它本身也有一种封闭